

港大團契五十週年特刊

CA 50th
Christian Association
50th Anniversary

(2004)

培育神學思考是港大團契的使命嗎？

關啟文博士

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

港大團契顧問

1981-82 年度港大團契副團長

1982-83 年度港大團契團長



CA（港大團契）與神學思考

我本身是CA人，已習慣了把港大團契稱為CA，下面也這樣做吧！CA向來有重視神學思考的傳統，聽說在六十年代較重視理性護教和較傳統的神學討論，到了七八十年代，CA大力提倡信仰反省（很多思想都在當時的《橄欖》——CA出版的月刊——中反映出來），那時比較流行質疑傳統教會對信仰的詮釋，並提倡對信仰、對福音有新的了解。說到底這種信仰反省也是一種神學思考，只是用較批判性的角度表達，我在CA的期間（1980-83）就是被信仰反省的理念激發去「啃」很多硬的神學書，並開始認識不同的神學派別，這種訓練使我後來去到英國念神學時，感到駕輕就熟，還拿到很不錯的成績呢！這可說是CA經驗給我的一點好處吧。

當時「信仰反省」興起的成因有很多，包括七十年代學運的衝擊，那時「放認關爭」的口號甚囂塵上，攪學運的人都好像很有系統的信念和遠大的使命，他們也有時會去挑戰基督徒，這一切都激發CA的信徒反思信仰。此外，大學環境本就傳遞一套知識份子的價值觀：誠實、求真、獨立、批判等。國際福音派領袖對信仰的反思也是那時的大氣候，1974年全世界的福音派領袖在洛桑開會，後來公佈的洛桑信約（Lausanne Covenant）重新肯定關社是教會使命之一，這使人對福音和教會使命的內涵作出反思。（我在CA的年代洛桑信約被視為必讀文憲之一。）最後，大學信徒本就對教會建制及傳統信仰有反動及不滿的情緒，信仰反省就好像成為了一種出口。

然而「信仰反省」的路線到後期愈來愈難維持下去。一個原因是信仰反省有時對信仰做成破壞性的後果，如《橄欖》50期就以「信與不信」為主題，有些編輯在裡面撰文表述由信仰反省到放棄信仰的歷程，這引起不少爭議。大學團契被一些教會列入黑名單，《橄欖》更是受禁制刊物，而信仰反省也沾上了一些負面形象。到了九十年代，信仰反省的熱潮淡下來，因為畢竟很多人回團契只是希望得到支持和感到溫馨，信仰反省所要求的自我批判和思想重建都需要極大的心力，和一定理性的能力，隨著

香港社會大氣候後現代化（消費主義當道、重 feel 不重理性等），這一切都顯得曲高和寡和吃力不討好。雖然如此，信仰反省的路線在 CA 有某種程度的保存，也或多或少滲透到其他地方。然而由於以上提及的困難，這條路線總是不斷被某些人質疑，引起反思和爭辯。我在下面談談我這 CA「老鬼」的看法。

信仰反省的反省

我當年任 CA 團長時的確把信仰反省當作整個團契的主線，但我不認為今天 CA 要盲目追隨那時信仰反省的模式，亦不應把這視作唯一的使命（其實在那時也不一定如此，我作團長時也很重視傳福音和基礎性的相交）。首先，我認為應更正面把這使命稱為「建立基督教世界觀（Christian worldview）」和「建立基督化心智（Christian Mind）」，其實信仰反省不一定是破壞性的，透過反省已有的信仰理念是否真實和適切時代／處境，可帶來信仰的深化和更新，這可減低「二手信仰」的問題：不少信徒不反省就全盤接受固有的信仰理念，會使信仰流於表面、僵化、與生活割裂…如 Richard Foster 所言，“The curse of our age is superficiality.” 很多信徒對任何問題都只能提供標準（而空泛）的答案，經不起深刻的追問或挑戰。經過反省，他們對信仰的理解可能更深刻。

然而重視批判的信仰反省也有不少陷阱，動不動就挑動信徒去掙扎「信或不信」，叫他們不斷質疑自己為何要信基督教、作基督徒，不一定是好事。其實八十年代的背景和現在不同，那時我們那些活躍於 CA 的 b/s 大多在中學已信主，已回教會多年和在基本信仰和護教上有裝備，不少人甚至對「基本福音」滾瓜爛熟，問題是對福音的理解較狹窄和僵化，所以那時的信仰反省模式不會即時做成流失，反而會激發信仰更新。然而近年入大學的基督徒的信仰根底似乎沒那麼扎實（可能是因為遲信主和少閱讀），他們對信仰的內容和原委還是不甚了了，我們就逼他們反省，似乎是本末倒置。

其實到了八十年代後期信仰反省也有激化的趨勢，而且毛病叢生。不少信仰反省組變成「教會批判組」，信徒輕易把一切問題歸咎教會。有些人把信仰反省與靈性進深分割和對立，也忘記了信仰反省很多時要有信仰實踐作基礎，於是流於整日空談，不去體驗，不作行動。此外，有些人把「信仰反省」絕對化，對傳統神學盲目抗拒，卻往往不加反省就接受俗世意識形態（Secular Ideologies），慢慢便失去信仰立場。久而久之，一些追隨信仰反省的人發展出自義和自憐的傾向，對傳統信念採取虛無和犬儒（cynical）的態度，往往「為反而反」！

建立基督化心智 (Christian Mind) 的使命

我認為應從更建設性的角度保留信仰反省傳統中優良的地方，首先我們要指出所有信徒都會面對俗世世界觀 (secular worldview) 的衝激與腐蝕，大學信徒更是首當其衝。所以我們應因應現在 b/s 的程度，盡量幫助他們建立基督徒世界觀，在過程中正面的教導和反思性的問題要有平衡，而教導和反思的內容都離不開神學——這名稱可能有點嚇人，但說到底只是指我們比較系統化的信仰理念，從這意義看每個信徒都有一種神學，分別只在於他的神學全面不全面，深刻不深刻。既然如此，大學信徒應把建設自己的基督化心智 (Christian Mind) 視為他個人的使命，因為這也是信仰進深的要求。

假若基督教世界觀建立得不健全，信仰就容易與生活割裂，信仰實踐也沒方向，信徒也可能積累不少信仰困惑，這樣就導致見證乏力。這一切為的不是拆毀信仰，而是去建立一動態 (Dynamic)、不斷成長、一路深化和更加豐盛的信仰，為要得著「充滿滿有恩典、有真理」的基督。(羅 12:1-2; 約 1:14; 腓 3:13,14)。此外，也是為了避免「信仰與社會、時代、實存處境脫節」的危機：社會和時代不斷變化，我們也不斷成長、進入不同處境和面對不同問題，我們初信時所接受的一套信仰不一定能應付新的情況，大學信徒也會面對更深刻的挑戰，他若能與時並進，積極回到聖經和基督教神學傳統，提昇自己的思考能力，他就可有力地以基督教世界觀去抗衡世俗世界觀。而且他經過大學時期的鍛鍊，將來也有能力幫助教會面對萬變的時代，仍能適切地見證信仰。

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

這樣看來，我認為 CA 過往對思想、神學和信仰反省的重視基本上是對的，只是在實踐時曾出了毛病。但在實踐這方面的使命時，我想有幾方面要留意。第一，培育神學思考只是 CA 多重使命之一，其實任何團契都應承擔敬拜、信徒相交、合一見證、信仰栽培、關心社會和傳福音的使命，建立對信徒的基督教世界觀是在大學處境做「信仰栽培」時，特別逼切和適切的工作，但它並非全部，也不一定是所有 b/s 的負擔所在。CA 應鼓勵 b/s 多作思考，但不應對他們做成太大壓力，也不應給人一個印象，只有重視信仰思考的才是 CA 人，畢竟每個人表達信仰的方法不一樣。

第二，要重視團契生活的基礎建設。神學思考也是在一個群體中進行的，缺乏彼此的交流和鼓勵，這種思考也難以持續。然而這已假設了有一群互相有歸屬、互相信任的 b/s，所以在談遠大的理想之前，CA 的 b/s 還是要把團契建設得有聲有色，不用

追求龐大的組織，但至少要能凝聚一小群穩定回CA，對CA有歸屬感的b/s，其他使命（如栽培工作）才能有效實行。

第三，基督教世界觀的建設要務實，由淺入深，假若一些 b/s 還停留在信仰初階，那就需要先作基本信仰培訓，和查經訓練。對較資深的信徒，可鼓勵他們看多點釋經書，對自己的信仰經驗多作整理和反省（這透過小組分享作最適合），務求將人生經驗每一方面都與信仰結連。最後，對較有恩賜作系統思考的 b/s，我們可鼓勵他們把基督教與其他信念體系比較和對話，和作信仰與學科的整合（Integration of faith & discipline），但我認為在這過程中要教導信徒認識豐富的基督教傳統，而不是輕易讓他們被流行的世俗思潮擄去（如自由主義、女性主義、後現代文化等）。最後若有一些人有召命，也應鼓勵他們去研讀神學和哲學，為教會作一個有識見、有使命感和有遠象的基督徒知識分子。

結語

我明白在現今的大學和社會環境中，作以上的一切殊不容易，我只希望CA能同時兼顧遠大的理想和踏實的實踐。在過程中仰望聖靈的能力和上主的恩典，不要灰心，只要從我們現今的起點，一步一步向著目標進發就不錯了。我深信每一代的年青信徒同樣承受神給他們的各樣恩賜，絕不會比前人少，深願我們一同努力，建設一個合神心意的CA，在港大校園中為主作美好的見證。

參考

Ronald Nash, Worldviews in Conflict (《思潮中的爭辯》，天道，1995)

James W. Sire, Habits of the Mind: Intellectual Life as a Christian Calling (IVP, 2000)

關啟文，《我信故我思—真理路上的摯誠探索》，香港：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，1998年9月。

梁家麟，《挑戰與承擔》，台北：雅歌，1998。